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李继凯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14032811

I207.42

111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李继凯 著



I207.42

111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北航

C1721056

1185804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李继凯著. —北京: 商务
印书馆, 2013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ISBN 978 - 7 - 100 - 10495 - 1

I. ①秦… II. ①李… III. ①小说评论—陕西省—
20 世纪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064 号

国家“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

此书修订获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K117)经费资助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李继凯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0495 - 1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6

定价: 56.00 元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编 委 会

顾 问：霍松林

主 编：张新科 李西建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歌东	尤西林	冯文楼	邢向东
李继凯	李 强	刘生良	刘锋焘
杨恩成	吴言生	张学忠	赵望秦
赵学勇	胡安顺	党怀兴	高一农
高益荣	程世和	傅功振	傅绍良
曾志华	霍有明	魏耕原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工作委员会

顾 问：霍松林

主 任：李西建 张新科

委 员：邢向东 赵望秦 霍有明 刘锋焘

赵学勇 李继凯 尤西林

总 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 1100 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首先，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代”的文化。其次，它是一种相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复次，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其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于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II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借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1.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 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 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 古今文学演变。以长

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1. 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 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

IV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3. 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区)人民的喜爱,已经入选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于这些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 “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 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

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生于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

VI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一定的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兼容并蓄:审美个性化的必由之路(代序)

——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畅广元

诗无达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话大抵都是在讲人的审美活动是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的,不可死板地划一求同。于是,也就有了一种误解,似乎审美的鲜明个性纯然就是一切均出自个人的见解,一切都要与他人求异。这种误解的危险在于它有可能让审美主体遁入自我狭窄的天地,到头来把鲜明的个性转换成明显的荒谬。其实,具有鲜明个性的审美与主体审美实践的兼容并蓄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没有兼容并蓄就没有个性鲜明的审美。最近,我读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的一部:《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作者是李继凯同志,在“后记”中他说道:“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也时有一得之乐,有些想法是有点‘别致’的。何况从地域文化角度来较为系统地考察秦地 20 世纪小说,也带有开拓性,即使是初步的,也是必要的,有一定价值的。”结合全书的实际内容看,他的这段话讲得很实在,在他所说的“一得之乐”、想法的“别致”和“带有开拓性”的考察中,读者均能从中见出作者审美的鲜明个性和判断的独到准确。然而这部书绝不是全用作者个人的见解写成的,也不是一切都与前人或同时代人求异

II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的。这就愈加强化了我的这种看法:兼容并蓄是通向审美个性化的必由之路。

还是从李继凯同志的这部书说起,在我看来,李著的成就主要有这么几方面:一是对 20 世纪秦地文化(包括民间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演化脉络论述和梳理得清晰;二是对秦地乡土小说的文化主题概括得颇有特色;三是对秦地小说的文化心态描述得相当准确;四是把作品的文化主题与文化心态同三秦文化的关系论证得得体可信,创见迭出。全书三十余万字,涉及的文化领域广阔,需要的资料量大,要认真阅读的短、中、长篇小说在百余部(篇)以上,而且要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对秦地小说作 20 世纪断代史的概括,实在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韩非子·解老》云:“论必盖世,则民人从。”而要有盖世之论,不资诸家之善,而兼有之,是不可想象的。李继凯正是驰骛乎兼容并包,勤思乎参天贰地,才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工程。具体地讲,他是在明确地追求自己对秦地作家作品与秦文化的关系之独特见解的过程中,认真翻检并吸纳了他人关于秦文化的研究成果,他人关于秦地作家与作品的评论以及其与三秦文化关系的见解,特别是通过作家自己关于其作品与地域文化关系的夫子自道和研究者对作品的分析之相对照的融会,才使这一有一定审美价值与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得以完成。

就治学而言,兼容并蓄与厚积薄发是相通的,可以说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就审美而言,“兼有”中何以显示自我的审美个性,似还有不少可说的话。在李继凯的这部书中,审美与治学是统一起来的,对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这一命题所包容的规律性

的东西的揭示，是以从区域文化角度对秦地小说进行审美感受为基础的，正是这种审美感受的独特和深刻，使得其科学的论证具有了说服力和感染力。那么，他是如何通过兼容并蓄走向审美个性化的呢？审美的个性是由主体审美角度、审美目的和审美方法构成的。角度，就是观察事物的出发点，对具体的个人来讲，这种出发点与其生存状态、生存境界是一致的，一般它常包容着主体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文化素养，甚至特殊癖好。有的人观察事物的出发点容易稳态化，他的个性须在这稳态中得到表现；有的人观察事物的出发点可以随对象与需要之不同而灵活变动，他的个性同样也会在变动中得到显示。对秦地小说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美，李继凯认为“从地域文化角度来透视文学世界的人文景观，自会领略到许多我们过去视而不见或格外小觑的东西”。不用说，他从“三秦文化”角度来透视秦地小说更能见出从习惯性角度见不出的东西。这种角度的变化是主体追求审美经验的丰富性和追求文学作品价值的多元化阐释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主体自我审美人格得以提升的重要标志。因为这种审美角度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主体审美领域的拓展，更其重要的，是其整体精神境界的升华。李继凯认为：“我们曾经极其迷恋洋人的东西，将舶来物视为稀世的珍奇，这促使我们生成一种开放的眼光，这于我们有益。”但是“向异域撷取的文化果实并非就是我们需要的——一切，甚至会像南橘北枳那样，因水土之异而恶变；固有的本土文化也能化育出富有营养的果实，地方‘特产’往往拥有更大的市场；尤其是以本土文化为主导与外来文化融合生成的‘新型本土文化’，常能结出更其丰硕的文化果实。”他的这段话既表明了新

的审美角度的选择是以深刻的文化反思为依据的,也告诉了人们他所谓的地域文化已经不完全是固有的本土文化,而是“以本土文化为主导与外来文化融合生成的‘新型本土文化’”。个中所显示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与审美角度的个性特色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实现这种角度的转换,却是以兼容并蓄为前提的,要反思“曾经极其迷恋洋人的东西”之得失,要较为准确地把握“新型本土文化”,无论如何都要非常认真地对待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要从对大量的文化研究成果的再认识中,从繁杂万状的活生生的现实文化形态中,敏锐地发现“新型本土文化”的结构性因素及其构成状态,而这就需要“非取制于一狐,而求味于兼采”。这里的关键是主体的辨析和选择要得当,否则兼容并蓄有可能把个性的东西溶解到诸家之中,主体的“本真”反被一般的“大家”所取代。一旦通过辨析和选择,主体独特的角度脱颖而出,它便会在其大脑的神经通路上形成主体新的审美兴奋点,使其在面对文学作品时,由于审美意向明确,艺术感受的灵敏度高,而较之他人更能发现其所想摄取的东西。李继凯在其专著中之所以能把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和魏钢焰等秦地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颇有见地地命名为“白杨树派”,并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二十世纪秦地小说的文化格局”,确实是有赖于他对自己审美角度把握得好,以及由此而对 20 世纪三秦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

审美目的当然是与审美角度紧密相关的,之所以选取这样的角度,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既定目的。然而目的本身也决定着审美活动的特点,抱着研究目的的审美阅读,不同于一般的欣赏阅读,它的目的性明确。如果说一般的欣赏阅读目的就在于笼统的欣

赏，因此止于美感，未尝不可的话，那么有研究目的的审美阅读，就不能止于美感，还必须把美感转化为一种理性认识，一种对规律性的思考。这种转化，从本质上讲，是把美感的创造性想象活动转化为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即概念运演活动，但这种概念运演活动又不同于纯然的抽象思维，给主体留下强烈美感印象的作品中的人物与情境，正是其得以形成特定概念，并保证这种概念在逻辑运演中清晰明确的依据，换句话说，这种概念运演并不割断与美感的联系，反而会互相强化，这就是文学研究中的理性认识总是具有相应的形象性与感染性的原因。李继凯为撰写《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而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就属于抱着研究目的的审美阅读，不过，他还有更具体的目的，即重建一个文学世界，而这个文学世界既与自己的父老乡亲 and 民俗风情有着血肉联系，又具有自己的审美方式和文化遗产。诚为他所说：“经过对‘文学与地域文化’这一话题的重新思考或反思，既可以激发我们重建文学世界的热情，也可以促使我们寻觅心萦神系的精神家园——那里不仅有炊烟袅袅、芳草青青、溪流潺潺、小路弯弯，更有我们自己的父老乡亲 and 民俗风情，以及我们自己的审美方式和文化遗产。”从这样的审美目的出发，他把秦地小说整体上给他的文化思想上的启示，以及这种文化思想赖以构成的作家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作品中的生动反映，分别概括为秦地小说的文化主题与文化心态，前者具体说明为“生存·创业主题，造反·革命主题，性恋·爱情主题和解脱·信仰主题”，后者则表述为：“求实求变心态，恋乡怀旧心态和废土废都心态”。他的这种关于 20 世纪秦地小说“文化主题”与“文化心态”的独到概括，显然是在已见先成的基础

上博采众家之善,才得以展开和论证的。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不仅采得博,而且用得巧。在说明“废土废都心态”时,他慧眼独具地引证了历史地理学家关于黄土高原历史时期生态平衡失调及其影响的研究成果,仅在行文的恰当处,只需笔锋一转,便把这种生态平衡失调所造成的“废土”现象与作家的特殊心态联系起来:“至少,这种荒芜的黄土地‘视象’,不是完全欺蒙人的感觉,那里在生态层面和心态层面都存在着再明显不过的‘废土’现象。面对废土,喟叹常常冲撞得人心窝窝疼痛难忍,作为黄土地的作家,必不可免在这种焦虑忧思中生成出趋向反思忧患的心态。这种心态也同样易于被‘废都’现象所诱发。”博采巧用从采什么和为何用两个方面体现了研究者的审美目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他由美感转化为理性认识的思路轨迹,足见,由兼容并蓄走向审美的个性化,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博采巧用。

审美方法既受审美角度的制约,又为审美目的服务,在三者的统一之中,凝聚着研究者阅读文学作品的审美个性。李继凯在对秦地上说的文化主题的分析和文化心态的描述上,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运思方法,前者的思路走向大致是从现实出发,现实所蕴涵的文化主题经由作家的创造性建构而在作品中得到映射。他说:“驻足于20世纪末的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从蓝田人的采撷、半坡人的劳作、轩辕黄帝的伟绩、西周青铜文化、始皇陵兵马俑、汉唐丝绸之路、临潼贵妃池、大雁塔、法门寺以及李自成的故地、延安的宝塔和窑洞等等可以直观的或想象的视域里,能否感悟出历史文化厚重的主题呢?应该说,秦地的小说家从这些历史文化的遗迹及其代表的文化传统中是能够感悟到或观察到那些